

陳岱孫文集



陈岱孙文集(上、下)

责任编辑: 彭松建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5.125印张 909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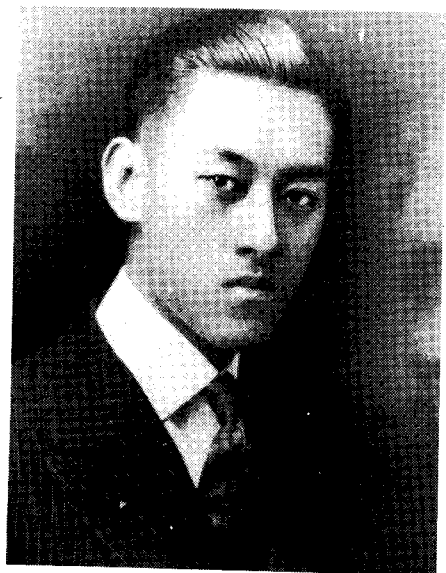
ISBN 7-301-01053-2/F·088

平装定价: 22.9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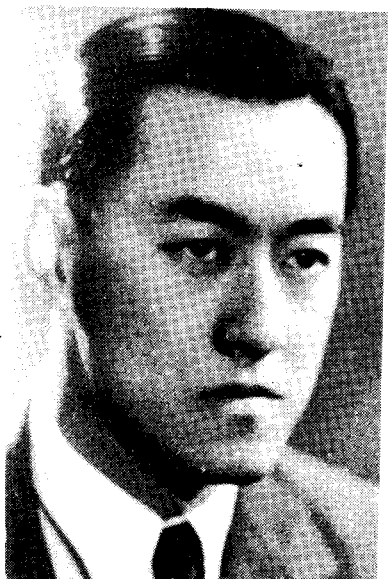


陈岱孙

→ 留学美国时期的留影
(一九二一年)



←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
陈岱孙教授 (1936)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
陈岱孙教授
(一九四一年)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陈岱孙教授 (1981年)



陈岱孙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8年)



陈岱孙教授和他的学生及其家属合影 (1981年)



陈岱孙教授和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们研究教学问题（1980年）



陈岱孙教授和外国留学生在一起。（1965）

陈岱孙教授和他的亲属及学生在一起
(一九八七年)



陈岱孙教授和亲属在一起 (1979年)



陈岱孙教授和亲属在一起 (1985年)



陈岱孙教授和他的学生晏智杰在探讨学术问题 (1987年)

编者前言

《陈岱孙文集》的出版,是我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令人欣喜的一件大事。

陈岱孙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早已蜚声海内外。他的出类拔萃的学历和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的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教学艺术,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称道,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钦佩。

许久以来,人们希望将陈岱孙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发表的各种思想成果加以收集和整理,结集出版。这不仅会使人们对陈岱孙的生平、著作和学术思想有更多了解,而且会对我国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遭受的外患,使陈岱孙痛失了将已经花费大量心血作好了准备的学术专著《比较预算制度》整理和出版的机会;而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内乱连同前此若干年已属非常的政治气氛和环境,又使他丧失了著书立说的宝贵时光。这就使得将他的文论结集出版愈发必要了。

可是,向来自谦的作者总觉自己一生平凡,无甚可称道之成就而不愿为自己出集。只是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众多同事、友人和学生们的坚持要求和一再催促下,陈岱孙才勉为其难地顺从了众人的心愿,并亲自参与和指导了本文集的各项准备工作。

本文集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辑录了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发表的主要论文四十余篇,始于1926年的博士论文,终于1947

年解放前不久针砭时弊的论文。下卷辑录的文章,除了1959年的一篇短文外,其余均为1979年以后的作品。其间长达二十年引人注目的空白,象一面无声的镜子,如实地映照出一位正直科学家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

※

※

陈岱孙原名陈总,他于1900年10月20日(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陈岱孙六岁入私塾读线装书,1915年秋考入福州市鹤岭英华中学,1918年夏赴上海考取了清华学堂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1920年夏毕业后被录取为公费留美生,赴美国深造。他先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1922年6月从该校毕业,于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6月被授予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4月赴欧洲大陆游学,主要在巴黎大学旁听金融方面的课程。同年底离开巴黎经马赛乘海轮回国,1927年2月抵沪,旋即奔赴阔别七年的福建老家。

从六岁进私塾,到二十六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陈岱孙系统地接受了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深厚而牢固的基础。勤奋学习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点,以致于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回首往事时,陈岱孙对少时躲在家里装满书箱的藏书阁楼遍览历史和小说等各类书籍的岁月仍记忆犹新,对留学哈佛大学时有幸在图书馆获一单人小隔间,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营养的经历仍无限神往。

爱学习必爱老师。陈岱孙对引他进入知识宝库、教导他做人的道理的启蒙老师尤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读过“私塾内外——童年学习生活片断”一文,体味一下陈岱孙的教师题在

团扇上赠给他的那首他“一直记着，不敢忘”的含意深远的诗，读者就不难领悟到陈岱孙一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进取的精神不是没有来由的。诗云：

本是龙门诤李膺，虬枝得所气休矜，
人间饮啄原前定，不露聪明即寿徵。

如果说幼年入塾读线装书是家庭的必然要求和安排，躲进阁楼“乱看书”是兴趣所致，那末，当陈岱孙迈出家乡，来到上海和北京以后，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则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青年陈岱孙的思想渐趋成熟了。

1918年夏陈岱孙赴沪投考清华学堂期间，在黄浦江畔公园门前撞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后的痛苦感受是他永远不能忘却的。“我斗然地止步了”，陈岱孙回忆说，“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走向客店，嗒然若丧，第二天乘船回家。我们民族遭到这样凌辱创伤，对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次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又给正在清华学堂就读的陈岱孙上了深刻的一课。他参加了游行、请愿、宣传等活动，尽管“只有摇旗呐喊的份儿”。陈岱孙回忆说：“我当时总觉我们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以上均引自《往事偶记》）。祖国的忧患终于在青年陈岱孙的心中引发出以研究经济学为国家民族富强效力的志向。

“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是陈岱孙1926年向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提交的作为完成哲学博士学位要求一部分的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对他留学期间学习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日后走上漫长科学研究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它不仅显示出年轻作者在学识上已达到的高水平，而且

体现了作者为文的若干特点。选题有相当难度：不仅问题本身繁难且无一致现成答案，而且有关资料也须付出巨大努力加以收集、整理和加工；何况选题所涉属于美国财政问题范畴，作为这个题目，对一个异国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陈岱孙取得了成功。他在大量地占有资料基础上，对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和中肯的分析，对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关系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并据此澄清和辩驳了若干歧见。陈岱孙的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科学价值。还应指出，该论文处处以事实为根据，一切结论都是在对丰富资料的周密分析之后得出来的，内容充实，论点有力，层次清晰，英语表达规范流畅，堪称实证研究的一篇范文。

※

※

※

陈岱孙学成回国之时，正值国内时局剧变之日。假如任职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友人的约请得以实现，陈岱孙也许会从此走上从政道路，至少有此前景。但不久形势逆转，宁汉分裂，革命遭到挫折，切断了赴汉的可能；恰在此时他接到清华大学邀请，于是再次北上，于1927年9月就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教授，时年二十七岁。从此开始了迄今已逾60载的粉笔生涯，教育成了他的终生事业。这个选择对青年陈岱孙来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且富于远见。他具备了从教的一切条件，他在教育事业中是会有所作为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教学有术的优秀教师，又是一位注重效率、善于处事、精明能干的领导者。1928年夏，时年二十八岁的陈岱孙教授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1929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授课的内容广泛，涉及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和财政金融等，有时同时开设三四门课，他均能胜任愉快，应付裕如。他讲

课语言精炼，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陈岱孙杰出的才干博得了同事和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

抗日战争期间，陈岱孙随同清华大学辗转长沙、昆明等地，和西南联大的师生一起渡过了八年令人难忘的岁月。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陈岱孙担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任，负责从日本投降者手中接管清华大学。

从1934年到1947年，陈岱孙在繁忙的公务和教学之余，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这是他在写作方面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这些内容广泛的文章中，有关经济建设和抗战期间的经济问题的言论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鲜明地反映了这位满怀爱国热情、追求社会进步的分子的政治态度，而且其中蕴含的许多思想和主张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发表于1936年初的“我们的经济运命”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带有纲领性的文章。针对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局，陈岱孙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借助外国力量、在经济上向列强“求恩乞怜”的亡国政策。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自己有决心、有能力，握住我们自己的经济运命。我们要知道，我们经济运命的决定，是我们神圣的责任和天然的权利。是责任，我们不能任意推诿；是权利，我们不能任意放弃。……推诿责任，便是不忠；放弃权利，便是不智。”他明确指出，如不认清形势并采取有力措施对抗外国经济侵略，不建立自立经济，中国必陷入殖民地经济的“体型”。在此体型之下，虽有一部分人可以尝到一些余沥，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生命就此丧失。随着经济主权丧失，“国家的政治运命恐怕只有悲惨的结果。”

三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高唱“经济建设”，却没有一个通盘规划，交通虽有所发展，而工、农、林、矿等业仍旧踏步不前；有的地方政府大搞消费性建设，而对生产性建设不予理会；有的地

方“百废俱兴”，最后落得“一事无成”。陈岱孙在“谈经济建设”（1936年）等文中对诸如此类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同一时期，拟创办所得、遗产税法的建议甚嚣尘上，政府人士倡言此举旨在改革原有税制不公的弊端。陈岱孙以其对中国传统积习的深刻了解，以一位财政专家独有的犀利眼光，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直截了当地指出，欲达上述宗旨，必须在以上二税初举之时，即致力于打破前此“税不上大夫”的习惯，集中于增加大富、巨商、资本家和达官贵人的负担，这“不但是希望矫正人民负担不均的办法，也是扩大税源的途径”（“所得遗产二税的举办与人民的负担”）。

抗战爆发后，陈岱孙在一系列文章（包括时评）中愤怒声讨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并着重论述了抗战条件下经济工作的各种问题，为支持抗战出谋划策。陈岱孙坚信抗战必胜，同时指出胜利之到来不仅仰赖于军事斗争，而且取决于后方的经济建设；他主张，为适应战时需要，必须采取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应当有一个符合应战需要、针对国情的通盘计划；而我国的国情之中最鲜明的特点即是“一切经济制度机构还是带着浓厚的中古色彩”，与侵略国的现代化经济相比，显然落后；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并非处处不如人；他反复指出，战时经济建设应当遵循若干原则，诸如（1）工业建设须与战事有密切关系，或为人民生活所需要；（2）工业建设须为现有人力财力所胜任；（3）新资源的开发应以供应前方需要，补助后方生产，维持一般人民生活为急务；（4）新资源开发还应注意本身与地方的适宜性；（5）农业的改造不可忽略，等等。除此以外，陈岱孙还就战时的交通、贸易、赋税、金融和币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富于建设性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陈岱孙同当时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期望能有一个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前景。面对日益严重的内战危险,1945年秋,陈岱孙和西南联大的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钱端升等教授联名发表了《十教授的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希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然而,随着时局发展,陈岱孙也象许多人一样,愈益看清了国民党反对派卖国、独裁的真面目。他在1947年7月发表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一文中,于是指出旧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衰落已成定势的同时,对“政治自由是否会随着经济自由之消失而消失,或者经济权力的国有可以仍不孕育政治的暴力”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和关注。如果说,这是作者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比较婉转而隐蔽地表露了对中国前途的担忧的话,那么,第二年,当国民党行将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陈岱孙毅然决定留在国内,迎接解放,就是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坚定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

※

※

1949年北京解放后,陈岱孙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岱孙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代理院长。1953年秋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54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组副组长。

建国初期,陈岱孙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深谙人类社会以及思想发展史、本人又有丰富阅历的陈

岱孙,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和加深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的信念;迎接解放时不免喜忧参半的心情已被满怀希望和信心的心情所代替。他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

陈岱孙这时期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之余,他于五十年代后期撰写了近四十万字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从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到十九世纪上半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册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到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各流派经济学。下册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这全套讲义是我国学者在解放初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以及研究马列主义经济思想发展本身的最初成果之一。西方经济学说原是作者的本行业务,现在有了新的认识;对马列主义经济思想的系统论述显系重新学习的成果;就所包含的范围、框架甚至基本论点来说,它实际上为其后几十年间我国经济学说史的教材勾勒了蓝图,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这套油印的讲义仅仅使用了两年,便在六十年代初高等学校内一次短命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的厄运,无缘问世了。但同作者后来的境遇相比,这不过是个开头而已。在“左”的路线支配下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一次甚于一次地恶化了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陈岱孙身不由已地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及至十年浩劫,他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了。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假话不愿说,真话又不能说,陈岱孙沉默了。整整二十年,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作过一次学术演讲,结果就在他的著作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小的空白。这岂止为陈岱孙一个人所独具,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遗憾和损失!所幸陈